

试论《儒藏》“论部”的分类方法

舒大刚*

(四川大学 古籍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为构建儒学文献的著录体系,本文历考古今目录分类方法,立足自创的《儒藏》“三藏二十四目”分类体系,贯通“四部”,归本儒学,提出应在《儒藏》“论部”按“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五类来著录儒家理论文献。

关键词:《儒藏》;目录分类;子部;三藏二十四目

中图分类号:G25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1-0052-08

关于《儒藏》编纂的方法和体例,我们曾在《儒藏总序》、《儒藏编例》^[1]以及一系列小文中加以探讨,提出了“三藏二十四目”的构想^[2]。随着四川大学《儒藏》“史部”首批50册的出版问世,儒学史料整理的基本方法亦即《儒藏》“史部”的框架也已构建起来,自古学人“佛道有《藏》,吾儒独无”的历史正在得到改写。由于文史哲领域一批著名学者如张立文^[3]、钟肇鹏^[4]、陈恩林^[5]、廖名春^[6]、蔡方鹿^[7]、黄开国^[8]、黄修明^[9]等先生的热情参与和赞襄,使《儒藏》编纂的体例和方法日臻完善。

川大《儒藏》本着“先难后易”、“先急后缓”的原则进行,首先整理相对难找、对于研究工作最为迫切、目前又最缺乏系统研究的“史部”,然后依次整理“论部”、“经部”。目前“史部”编纂体系粗具,接下来首当考虑的就是“论部”的编纂框架问题。为了获得专家学人更多的指正和帮助,这里先谈谈川大《儒藏》“论部”的基本构想,愿识者不吝赐教。

一、传统目录涵盖百家,其“子部”不可照搬入《藏》

编纂《儒藏》既是创新也需要继承,它是在继承传统目录学分类成就、佛道二“藏”编纂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儒学文献进行的系统归类和整理。为达到预期效果,创建儒学文献自己的著录体系,以便在此体例下编纂出一部分科学、收录广泛、使用方便的大型丛书,就势在必行了。《儒藏》在体系上没有成例,需要创新;《儒藏》在内容上又是传统的,需要继承。如何用一种创新的体例来收录这些传统的内容,就是今天《儒藏》编纂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儒藏》“论部”所要面对的是儒家各个领域的理论文献,这些文献虽然论的都是“儒”,谈的都是“理”,但是儒有派别,理有分殊,主题不同,观点亦异,如何将 these 著作系统归类,编成著录科学、使用方便的专题丛书,又是编纂“论部”所必须探讨的。

目前有一种论调,以为编纂《儒藏》可以照搬《四库全书》体例,儒家的理论著作可以直接承用“子部”分类方法。我们期期然以为不可。如果照搬“子部”,不是失之“太杂”,就是失之“不全”。

(一)所谓“太杂”,是由于“子部”非仅儒学一家,而是兼容诸子。虽然“子部”所录主要是理论性和技术性著作,“儒家”文献也在其中;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它诸家也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儒”的烙印。但是《四库全书》系综合性丛书,其“子部”系诸子百家著作的总汇,严格意义上的儒只是其中一家,我们要编纂儒学的专题丛书,当然不能将其它诸家也一并揽入。仅此一例即可断兹说之胶柱鼓瑟、滞碍不通了。

从历史上目录书的著录情况考察,综合性目录“子部”都是诸子并重、百家兼录的。《汉书·艺文志》虽然上承秦氏“焚书”、汉武“罢黜”之后,“诸子略”还著录诸子著作189家、4324篇,包含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九流十家”之书。儒家虽居其首,但只有53家、836篇而已,占整体篇卷份量还不到五分之一。

即使在儒学独尊时代,虽然战国时期“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

收稿日期:2005-09-20

作者简介:舒大刚(1959—),男,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主要从事儒学史及儒学文献研究,担任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课题、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首席专家、主编。

火”(《汉志》小序)的“诸子”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子学”概念的扩大,目录分类的调整,“道术”降成“方术”,“七略”转为“四部”,其它言技艺、方术的著作也包含在“子部”之中了。《隋书·经籍志》所谓:“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并且以为:“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正是这一思潮的反映。于是《隋志》将《汉志》所分“《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汉志》中还独立于“诸子略”以外的兵书、方技、数术等著作,现在都统统进入了“子部”。于是形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14个类目。《隋志》所录诸子853部、6437卷(未计未附的佛教、道教作品);儒家只有44部、530卷(即使“通计亡书”,也才67部、609卷),在其中只占有十分之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子部”都是如此,收录的子书达17类。这一情况即使到了被部分学人认为具有“儒藏”性质的《四库全书》也没有改变多少,“子部”仍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内中还包括《隋志》的名、墨、纵横等家以及佛、道二教。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图书数量的极大增加,“子部”图籍更为广博。50年代上海图书馆主编的全国丛书联合目录《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为所收2797种丛书子目进行分类时,“子部”就有周秦诸子、儒学、兵书、农家、工艺、医家、历算、术数、艺术、杂学、典故、小说、道教、佛教和其它宗教共15大类。

固然,在儒学至上的时代,各种思想无不受儒家影响,无不打上“儒学”的烙印,《汉志》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隋志》也将兵家与医方说成是“圣人之道”在“治世”的各个领域表现出来的“圣人之政”,但是那也只能是儒学之变或儒学之用,不是儒学之本、儒学之体。如果单从“用”的角度看,儒生可以运用“医方”来悬壶济世,道家、佛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说儒学对其他诸子有影响而使其带上“儒”的特征,那么道教、佛教又何尝没有对诸子甚至对儒学产生影响呢?《儒藏》之不能将整个“子部”搬入,正犹《佛藏》、《道藏》不能将“儒学”搬入一样,是不言自明的。从前道教徒编纂《道藏》,将墨家、名家、阴阳家、法家乃至医家的书籍都收录其中,就曾引起学人的疵议,今天编《儒藏》当然不能重蹈其覆辙。

著名宗教文献研究学者钟肇鹏在《略谈〈儒藏〉的编纂》中即明确指出:“例如《道藏》,从宋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就收入医药类的书籍。北周时的《玄都经目》收入诸子书八百余卷。现在明正统《道藏》中也有《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本草》等医书凡20种。诸子书收得更庞杂。《道藏》中把属于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编入是无可非议的。但将《墨子》、《韩非子》、《鬼谷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甚至《孙子兵法》都收入《道藏》中,显然就不恰当。但《道藏》编纂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就是如此,后世只好遵循。现在编《儒藏》恐怕不能把医药书及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均收到《儒藏》中。”所言十分中肯,值得我们深思。不仅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状态下各呈其说的“诸子”不能以一个儒家来概括,就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虽然各鸣其“道”的诸子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天文、历法、农艺、医术、卜筮、艺术等学艺、方术之书乃至缙流黄冠著作都转入了“子部”,这以后的“子部”似乎更不能“用儒学”来涵盖了。因而无论是“百家争鸣”时的“子”,还是“儒学独尊”后的“子”,都不能整体地搬进《儒藏》。

(二)所谓“不全”,是指传统“子部”不能涵盖所有儒学理论文献,如果只收“子部”而不顾其它,又会出现“偏举不备”的现象。历史上儒者的成就是多面的,许多儒者既有经学、子学著作,也有其它方面的著作,他们在其它著作中也常常甚至大量讲明儒理。孔子既删订《六经》,又留下了《论语》(弟子门人所编);孟子既传《诗》《书》,又与万章、公孙丑之徒著《孟子》11篇;荀子既传《礼》《乐》,又著《荀子》一书。这在当时而言,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六经》,是以旧史为教本的经典文献;而《论语》、《孟子》、《荀子》等则是孔、孟、荀的私家著述,属于在思想上受经书影响而文献上并非历史的著作,本当属之诸子,故战国、秦汉之世统称之为“传记”。汉以后由于尊孔孟而退荀卿,《论语》、《孟子》皆置博士以授弟子。至刘向、刘歆整齐百家,撰《别录》《七略》,《论语》列在“六艺略”而获“经”的待遇;《孟子》至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马端临《文献通考》也与《论语》同列“论孟类”而著“经部”,至《明史》则为“经部”的“四书”之一。至于《荀子》则一直以“儒家类”的身份抑居“子部”。

后世儒者,或依经立传、附传作疏以阐哲思;或别立新说,自为起讫,另成专著;或随感而发,因事立论,撰为文章。其依经立传者,皆随经著录在“经部”;其自成专书者,则作为“儒家类”列在“子部”;其发为文章者,则随文集收在“集部”之中。如大文豪苏东坡,他有《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其弟子由有《春秋集解》、《诗集传》,是为“经部”著作;东坡又有《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子由有《老

子解》(主“三教合一”),是为“子部”著作;另外,他们还有多篇学术论文,如《易论》、《诗论》、《书论》、《春秋说》、《诗说》、《论语拾遗》、《孟子解》,以及其它“史论”、“政论”等文章,却收在了各自的文集之内。编《儒藏》当然要收他们的经部著作、子部著作,但也不能忽略其集部的学术文章,相比之下,他们文集内的专论比之“子部”诸书更加贴近儒学。《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是有道理的。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谓:“古来文字只有二体,叙事记言者为史体,自写性真者为子体。圣人之言足为世法,尊之为经,经固兼子、史二体也。文事日兴,变态百出,歧而为集,集亦子、史之绪余也。”也是就此而言的。

传统目录书由于受“四部”法的限制,儒家的这些理论著作被分散在各处,不仅“经部”有,“子部”有,而且在“史部”和“集部”也大量存在。如果说儒家的“经部”文献是“依经说事、据经说理”的话;则其脱离经书直言义理的著作,在先秦两汉则集为“子书”,被目录书列入“诸子略”或“子部”。魏晋以后,由于“别集”、“总集”的渐次兴起,后儒的这类理论性文章又被收录到“集部”。随着儒家理论体系的逐渐完善,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儒家不仅在思想文化,而且在政治、经济、历史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又被传统目录书随方编入“四部”各处了。其以史论事或以儒论史的著作,被放在了“史部”的“史评类”;以儒论政或以政辅儒的政论性书籍被放在了“史部”的“政书类”。天下文字,不归子则归史,儒家著述也不例外,不在“子部”即在“史部”,甚至还广泛地分散在“集部”。我们要编纂一部反映儒学成就及其历史的大型丛书,这些著作显然是不可忽略的。

由于我们已经将《儒藏》“史部”定义为“学史”即“儒学之历史”的主题,儒家“史学”特别是“史论”的著作当然就不能再放入“史部”。我们又考察得知“集部”文献相当复杂,不宜一概收录入《藏》,也不可能再像《四库全书》那样设一个“集部”来加以收录。如果要完整充分地收录儒家的理论文献,全面系统地展现儒学理论成就,就必须突破传统“子部”范围,而将“史部”和“集部”的相关内容选编和辑录出来,编成一个个专题论集,汇入《儒藏》“论部”。这样,一部综合收录和系统整理儒学理论文献的“儒论集成”就规模粗具了,这就突出地表现出了《儒藏》编纂的“继承”与“创新”的特点。

由上可知,传统“子部”一方面著录百家,不专儒术,整体收之,杂而不淳。另一方面儒家理论又散在四部,今日编《藏》,应力求其全,如果局限于“子部”,不管其它,必将挂一漏万,“偏而不全”。既“杂而不淳”,又“偏而不全”,照搬或局限《四库》“子部”之论,亦可休矣!

二、儒家诸子主题纷如,不可杂乱无章收入《儒藏》

儒家诸子文献有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儒学文献的类别也是由单一到复杂、由综合到专门的过程。即使在“子部·儒家类”中,也不可不加别择,不加区分,一概照搬。

自孔子创立儒学,后学沿波,历2500年,其间流派众多,学术各异。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文学、政事之别。《韩非子·显学》有“儒八、墨三”之分,《荀子》亦有“非十二子”之说。自后“子学”演为“经学”,“汉学”变为“宋学”,宋学之中又有“朱陆之争”,心学之内又有“陆王之别”,时代既异,学术亦变,道既不同,谋亦异趋。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通经致用而已。后世学人,自命圣贤,穷性尽命,务极造化,遂蹈于虚玄之境。于是“性理”与“道命”日兴,“心学”与“理学”呈能。于是言道德者有之,言政事者有之,言性理者亦有之,言经学者亦有之。自昔孔门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尚思派、博学派”之别,孔子之后岂无“实用家、玄学家”之别?儒学风格既变,儒家理论亦繁,儒家的子部文献在数量上也是日益激增,在内容上、主题上都异常丰富。

如果说,《汉书·艺文志》阶段的中国儒学还是以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即经学)为主体,那时“儒家”文献还在于对儒家道德、政事等基本问题发表看法,还属于儒学“性相近”的阶段的话;那么,进入魏晋以后,儒学诸子则进入了“习相远”的时代。儒学积极入世、热情救世的总体特征,使其理论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各类社会问题、人伦问题甚至历史问题进行专题的思考和分别论述;由于玄、佛、道等不同的思想方法的浸入,也使儒家学者最关注的课题、认识问题的方法也产生了变化,于是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专题文献。儒学诸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主题上,都大大地有别于前,已经不能宜只用一个“儒家”的称谓来概括一切了。《儒藏》如果只笼统以一个“儒家类”(或“儒学类”)来予以收录,势必杂乱无章,主题不明,著录无序,求书无门。不仅不能很好地展现儒学在各个专门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而且也不利于现代和未来学人从事儒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如《汉志》“儒家类”所录有:《子思》、《曾子》、《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魏文侯》、《李克》、《公孙尼子》、《孟子》、《孙卿子》(即《荀子》)、《聃子》、《内业》、《周史六弢》、《周政》、《周法》、

《河间周制》、《谰言》、《功议》、《宁越》、《王孙子》、《公孙固》、《李氏春秋》、《羊子》、《董子》、《侯子》、《徐子》、《鲁仲连子》、《平原老》、《虞氏春秋》、《高祖传》、《陆贾》、《刘敬》、《孝文传》、《贾山》、《太常蓼侯孔臧》、《贾谊》、《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董仲舒》、《儿宽》、《公孙弘》、《终军》、《吾丘寿王》、《虞丘说》、《庄助》、《臣彭》、《钩盾兄从李步昌》、《儒家言》、桓宽《盐铁论》、《刘向所序》、《扬雄所序》。

这里所录多以作者姓氏为称,表明该作品系作者一身著作的集成,如《子思》、《曾子》、《漆雕子》等皆是如此,故余嘉锡有“古之诸子即今之文集”之说。不过这种情况在汉代已经有所改变,《汉志》所录儒家诸子已经出现了专题文献,根据班固自注,《周政》系“周时法度政教”,《周法》系“法天地立百官”,《河间周制》“似河间献王所述(周时制度)”,《谰言》系“陈人君法度”,《功议》系“论功德事”,又据颜师古注,《周史六弢》系“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桓宽《盐铁论》系“孝昭与诸贤良文学论盐铁事”。据此可知,《汉志》所录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子学著作,而兼及旧史、官制、法度、政事、经济等内容的书籍了。此外《汉志》还将个人所著丛书性质的“刘向所序”、“扬雄所序”也列在“诸子略”的“儒家”之中,“刘向所序”共67篇,内含《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扬雄所序”38篇,内含《太玄》、《法言》及三篇《乐》和两篇《箴》,内容已经与先秦子书有很大区别,说明儒家子学著作内容和范围在汉代都已扩大。

及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在著录《晏子春秋》、《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孟子》、《孙卿子》,至《袁子正论》、《新论》、《志林新书》、《要览》、《正览》等传统子书的同时,还著录有《诸葛武侯集诫》、《众贤诫》等格言汇编,著录有《女篇》、《女鉴》、《妇人训诫集》、《妇奴训》、《曹大家女诫》、《贞顺志》等女教闺训。儒家子学的内容和范围在此又有了进一步拓展。《旧唐书·经籍志下》著录儒家子书80部、782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儒家92部、791卷;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儒家90种;郑樵《通志》著录儒术124、1613卷、370篇;《宋史·艺文志》著录儒家169部、1234卷篇;《明史·艺文志》著录儒家140部、1230卷。

如果说此时儒家子书数量尚少,即使不作分类也无妨检求。但是,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儒家子书日益增多,不加区别就查找为难了。《四库全书》收录儒家类112部、1694卷、另有儒家类存目307部、2369卷,两目相加有419部。至《中国丛书综录》其“儒家”和“儒学”两类即达1100多种。在这么多的儒家诸子著作中,主题和类别必然较《汉志》、《隋志》时代大有不同。特别是宋儒以后刻意标新立异之风盛行,文献激增、主题纷繁是自然的事。《四库总目》谓:“至宋而门户大判,龃齬相寻,学者各尊所闻,格斗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载。”门户立则异说生,异说生则文献繁。在这么多的家法、宗派中,儒学文献的繁杂是可想而知的。即以《通志》汇录各种艺文志而成书的《艺文略》论,“儒术类”除了传统的儒学诸子外,还有家训著作:《颜氏家训》、《诫子拾遗》、《开元御集诫子书》、《狄仁杰家范》、《卢公家范》、《家诫》、《司马温公家范》、《先贤诫子书》等;有心性:《至性书》、《四部言心》等;有政论、官箴性著作:唐太宗《序志》、《帝范》、《天训》、《紫枢要录》、《臣轨》、《百寮新诫》、《少阳政范》、《列藩正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平台百一寓言》、《君臣政理论》、《十代兴亡论》、《帝王略论》等;还有谏书:《魏征谏事》、《谏苑》、《谏林》二种等;还有格言:《诸经纂要》、《经史要录》、《读说苑》、《百行章》、《前代君臣事迹》、《维城典训》、《维城前轨》等;还有法语:《五经妙言》、《六经法言》、《羣书治要》等。如果按专题细分下去,在儒家文献中不难发现数十个主题。

面对这么多主题的文献,如果不加排比、不加甄别,一概笼而统之地收进《儒藏》“论部”,给人造成的必然是混乱无序的印象,让读者不得头绪难以入手。况且,这些专题文献是历代儒者对各个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晶,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应该广泛收集和妥善保护,而且应该进行专项研究,认真吸取。历史上这类文献由于没有得到认真的专题化整理,长期埋没于浩瀚的书海之中,主体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彰显,先儒理论的灵光长期被淹没在故纸堆中。更有甚者,由于缺乏专题整理和搜求,专题文献也就没有机会得到系统、全面的收录和保存,许多重要文献已经在人们的疏忽懈怠之中渐次失传,尸骨无存了!中国古代儒家专门术学之不兴,明清以后中国科学之不振,其原因也许多种多样,而没有对子学文献进行专题分类著录和系统整理,不能不算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文献学目录学上的一大遗憾,也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损失。

郑樵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

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通志》卷71）所言十分深刻。无论从全面收集和保存儒学专题文献计，还是欲加强儒家专门之学的研究，都有必要对儒家子书进行专题分类和系统整理。本乎此，如何能将传统的“子部儒家类”笼统地一骨脑儿收入了事呢？

三、《儒藏》“论部”当拟五大专题选录文献

编纂《儒藏》本意就是要使儒家文献得到系统整理，使儒学研究向更专门更深入的方向发展，首先对儒学文献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式的系统分类是理所当然的。《儒藏》“论部”编纂也要对儒家子学著作进行系统分析归类，然后再行整理出版。根据儒家学派的理论特点和儒学文献现存状况，我们可参照古今目录分类方法，将儒家理论著作分为“儒家类”、“性理类”、“礼教类”、“政论类”、“杂论类”，五类之下，还可以根据文献的多寡和内容的状况再分若干小目。如“礼教”下可以再分为“蒙学”、“劝学”、“女教”、“家训”、“俗训”、“乡约”等；“杂论”下可以再分“杂说”、“杂考”、“史论”等。下面试作逐项介绍：

“儒家类”如前所述在《汉书·艺文志》已在“诸子略”设“儒家类”著录儒家的子学文献了。后世目录书无不如此，或称“儒家”，或称“儒学”，或称“儒术”，名称虽易，实质未变。它们的著录范围，或为通代（如《汉志》《隋志》、两《唐志》、《宋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或为断代（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至张之洞《书目答问》而有所改变，《子部》题注：“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若分类各冠其首，愈变愈歧，势难统摄，今画周秦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学寻览，汉后诸家，仍依类条列之。”于是在传统“子部”前单列出一个“周秦诸子类”，儒家（如《荀子》、《孔丛子》）与道、法、名、墨合在一处。紧接“周秦诸子”之下又立“儒家”为一个目，著录汉代扬雄《法言》以下的儒家文献。将儒学分成子学时代的“儒”和经学时代的“儒”两截。《中国丛书综录》继承这一方法，也在第二册《子部》之首设“周秦诸子类”，下列“儒家之属”，著录《孔子家语》、《晏子春秋》、《荀子》等先秦儒家著作，以及《圣门十六子》、《玉涵山房辑佚书》等后人辑佚的先秦子书。此外又有“儒学类”的大类，著录汉孔鲋《孔丛子》、陆贾《新语》以下的历代儒学著作。

《书目答问》意在为初学者提供读书方便（“以便初学寻览”），其将周秦诸子集中在一起固无可。但是从编纂足以反映学术流变的大型丛书立意而言，这一区分就有不太合理的地方，因为它注意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区别，却忽略了儒学内部“分中有合”、“变中有不变”的事实。就其“变”者言之，儒学当然可以分为子学与经学两段，而经学中又有汉学、宋学、清学之别，汉学又有今文、古文之异，宋学有理学、心学、气学和事功之学的区别，如果要分都得分别对待，不能只分先秦不分后代。就其“分”者而言，汉以后之儒学固然与先秦不同，但是先秦已是“儒分为八”、“孟荀互异”了，后世的派别当然更多，其状况比之先秦的“百家争鸣”未必逊色，如果再分下去岂不琐碎！况且儒学虽然经历2500年的变化发展，其间也有一贯不变之道，那就是同以孔孟为宗师，以“仁义”为主题，以《六经》为教本，特别是一批志在传承“周孔道统”，力图继承“纯儒风范”的儒者，更是保持了儒家原有的传统。先秦儒家的风格并不是在汉代就嘎然而止了，其风格和传统在后世也还大量存在，传其学、著其书者不乏其人。儒学在百变之中有不变者在，如果看不到这种不变的一贯性，就不利于发现儒家的传统风格，不利于认识儒家历史的悠久性，也就不能使人油然而生“儒学悠久、兹道广大”的崇敬之情。因此纯粹按时代划分是不科学的。《儒藏》“论部”应将整个儒学纳入自己的观照视域，将历代儒学拉通起来考量，按其思想内涵而不是按时代来分类。我们将历代沿袭先秦儒家“游文六艺，留意仁义”特征的著述通归在“儒家”，而将儒术在诸领域之运用者另立专题性类目，以便区别对待。因此，《儒藏》的“儒家类”不仅包括了周秦诸子的儒家，而且也应该包容两汉以后仍然坚持先秦儒家特色和风格的儒学著作。本部分拟选自《孔子家语》、《晏子春秋》、《荀子》以下至谭嗣同《仁学》、章太炎《诂书》等200种左右图书^[10]。

“性理类”是著录儒家讲心性、命理的著作，以宋儒、明儒为代表。孔门已有“尚思”、“贵学”的区别，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心性一派，实为“性理”之学的鼻祖。两汉时期，儒学内部有“经学”的今文和古文、家法和师法的区别。魏晋以至明代，儒学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战，又产生了“玄学”、“理学”乃至“心学”，从而在方法上和理论上与原始儒学立异。为了与传统儒学相区别，元人修《宋史》时，将坚持儒家本色、运用经学方法研究儒学的学者仍然列在《儒林传》，而对着意于心性、道学研究的儒者另创《道学传》来加以表彰。这是符合当时儒学历史情况的，是反映学术实际的作法。《四库全书总目》却加以指责：

“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讎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子部儒家类序）是否因儒学内部门户之争而导致明朝的社稷倾覆姑且不论，但说宋代以后儒学内部“二派笔舌交攻”，“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讎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却是历史的事实。学术的门户之争肯定不好，但是已经成为历史又何必讳言呢？就反映学术史实际而言，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倒是历史研究所必要也是必须的态度。可惜《宋史》只在传记类区别对待，而在目录上却未作区分，《艺文志》只有儒家而无道学，周敦颐《太极通书》、张载《正蒙书》、程颐《遗书》及《语录》、《诸儒鸣道集》（濂溪、涑水、横渠等书）及《近思录》（朱熹、吕祖谦编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书）等标准的理学家即道学家著作，也都列在《子部》“儒家类”中。

明永乐中，胡广等受命修《五经大全》，汇集宋儒以下经学成果；又奉诏将周、程、张、朱诸儒的性理之书，类聚编成《性理大全》70卷，也是明智之举。王圻更独具只眼，《续文献通考》将儒家之书“各以学派分之，以示区别”。对于展现和研究儒家的学术流派，考察宋明以后儒学分而为道学的演变历程，具有积极作用。可惜这一作法没有传承下去，反而遭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然儒者之患，莫大于门户。后人论定，在协其平。圻乃门户限之，是率天下而斗也，于学问何有焉。”因此《四库全书》所录“但以时代先后为序，不问其源出某某”（子部儒家类按语）。这实在上是一种倒退，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不失孔孟之旨”（子部儒家类按语），其实不然。

《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子部·儒学类”专列“性理之属”著录宋人林逋《省心录》以下邵雍《渔樵问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西铭》、《正蒙》、二程《遗书》、《语录》、朱熹《近思录》、《朱子语类》、陆九渊《象山要语》、王阳明《传习录》等，最为可取，今兹从焉。

“礼教类”著录以礼乐教化为内容的著作，其下可分：“蒙学”、“劝学”、“女教”、“家训”、“俗训”、“乡约”、“劝善”等子目，以便更专门、更具体地展示儒家礼教的具体内容和成果。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亦主：“杀诗书而隆礼乐。”《大学》之道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为“治平”之本，而蒙训为修身之端，《易》曰“蒙以养正”是也。故历代儒者致力礼乐教化不遗余力，礼教之书实繁其编。礼的内容至广，下而童蒙之教，上而君臣之礼，外而社会风俗，内而家庭伦理，莫非礼也。故士有蒙训劝学，女有女教闺训，家有家法家规，乡有乡规乡约，纯风俗则见之俗训之篇，正人心则见诸劝善之书。从而构成一个从人心到风俗、从家庭而社会的移风易俗、淑世济人的高度自律自觉的礼教体系。

《汉志》“六艺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遂将文字学著作、识字课本概称为“小学”，而列在“六艺略”。又将《弟子职》等蒙训书籍列在“孝经类”，亦居“六艺略”。这一分类方法为后世目录所继承。《文献通考》卷190《经籍考》在“经部·小学类”著录“《弟子职》等五书”，陈振孙谓即：“漳州教授张时举以《管子弟子职篇》、班氏《女诫》、吕氏《乡约》《乡礼》、司马氏《居家杂仪》合为一篇。”《千顷堂书目》“经部·小学类”有：吴讷《小学集解》、丘陵《婴教声律》、廖纪《童训》（《女训》附）、湛若水《古今小学》、朱升《小四书》（集方逢时《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训》、陈栌《历代蒙求》、黄继善《史学提要》）等。《明史》承之，亦将蒙训读物列在“经部·小学类”，甚至还有16种家训（朱有炖《家训》、王士觉《家则》、杨荣《训子编》、曹端《家规辑畧》、杨廉《家规》、何瑭《家训》等），10余种闺训（洪武《女诫》、高皇后《内训》、王敬臣《妇训》等）以及1种劝俗文（文皇后《劝善书》）。这些书籍之所以归在“经部”主要是出于对古志所谓“小学”乃“学小道焉，践小节焉”的理解，当然也有重视礼教的一面。

至清《续文献通考》根据思想内涵，将礼教类著作调归“子部·儒家”，使其成为儒家子学著作的一个部分。卷160《经籍考》“经部·小学类”序：“马端临《通考》‘小学类’自训诂、音韵、字学各书之后，如《兰亭考》、《十七史蒙求》、《弟子职》等书皆列焉。今续辑此门，惟训诂、字书、韵书以类相从。余如《帖考》则归‘目录类’，《蒙求》则附‘类书’。其有关于养正闲家者，皆入‘儒家类’，庶区分部别，不使错杂云。”这一分类法较之以前更为合理，《中国丛书综录》在“儒学类”特设“礼教之属”，并分成“鉴戒、家训、妇女、蒙学、劝学、俗训”等六目。今修《儒藏》将继承这一传统而稍事损益，特立“蒙训、劝学、女教、家训、俗训、劝善、乡约”等目，而成“论部”的“礼教类”。

“政治类”收录儒家议政言治的著作。孔门四科，“德行”以修身力行为本，宋明儒学崇尚心性、命理，

即此派之光大者。“语言”以游谈折冲为事，衍为后世之“纵横术”，已出儒术之外。“文学”则依经说事，即后世之“经学”，自有“经藏”著录。“政事”具有“经世先王”之志，力倡“仁政德治”之说，为儒家一贯不二之法门。《庄子》概括儒学为“内圣外王”之道，正是孔门“德行”、“政事”二科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政事”系儒门四科之一，“治平”系《大学》至高之教，《周官》、《为政》昔曾载于周公之《书》，《周制》、《周法》亦复著于《汉书》之“志”，说政言治固为儒者专门。

后世人文日修，政事益繁，制度法规，越演越烈。讲制度则有官体、政体之分，言法则乃有治道、治法之别，易而言之，即政治制度、官僚制度、政治理想、为政方略，是皆“政治”之属。其讲制度者多近于“历史”，其讲道法者实属于“子部”。《隋志》于“史部”立“职官类”以纪设官分职之书，固无可不；然而该类又兼及为官之道的书，却少伦类。唐太宗撰《帝范》、武则天撰《臣轨》，讲求君臣之道，书目诸家列在“子部”儒家，是为得之。明钱溥《秘阁书目》又立“政书类”兼录政治各书，于是政论著作又脱离“子部”而入于“史”。《文渊阁书目》“史部政书类”除了著录《元典章》、元《风宪宏纲》、元《省部政典举要》、元《风宪宏纲》、元《成宪纲要》、元《谕民政要》、元《通制》等制度法规的书籍，还著录有苏子启《有官龟鉴》、刘漫塘《荒政续编》、陈石灵《莅民提纲》、陈石灵《州县提纲》、张养浩《庙堂忠告》、张养浩《风宪忠告》、张养浩《牧民忠告》、李元弼《作邑自箴》、秦辅之《资政格言》、蒲登辰《救荒续录》等官箴性文献。由此可见，关于政治类的书籍，传统目录或分在“子部”儒家，或列在“史部”政书、职官等处，分布既广，翻检为难；而又子史混同，专题不明，故无可取。

《儒藏》“论部”将今立足于“政治理论”和“为官之道”的主题，选录儒家政论性、官箴性文献，自旧题马融《忠经》、唐太宗《帝范》、武则天《臣轨》以下，至于清末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凡100余种，以备“政治类”。

“杂论类”系收录论杂、体杂的儒家子学著作。所谓“论杂”是说其书主题不一，内容不纯，或议及百科，或事涉三教，不可以归入以上四类。所谓“体杂”是其撰述体例没有成宪，著作方法也不系统。此类之下，又拟分“杂说”、“杂考”、“史论”三目。

先秦诸子有“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后世儒学议论多端实有“杂学”之实。自孔孟创教，后儒沿波，学随世变，论从心生，一人一是非，一派一主张，于是“杂说”、“杂论”生焉。又载籍既博、论题亦广，学理不辨不明，掌故不考不清，于是“杂考”、“杂纂”出焉。《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秦汉的“杂家”列于“诸子略”。历代目录，亦复如是。至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的“杂家类”在概念上发生了改变，以为“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后代沿之。然寥寥无几，备数而已。今削之，总名之曰‘杂’。”黄氏的“杂家”已经不专指“义兼儒墨、学包名法”的杂家了，而是将后世已经不传其学而空存其书、虽有其目却文献太少的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统统归在一起视为杂家了。《明史》艺文志《子部》从之。“杂家”概念从《汉志》所录一书兼“儒墨名法”之说，变为一类兼收众家之书了。

清修《四库全书》对《千顷堂书目》有继承也有扬弃，一方面批评：“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并为一类，总名‘杂家’，虽亦简括。然名家、墨家、纵横家传述者稀，遗编无几，并之可也。并法家删之，不太简乎！”（《千顷堂书目提要》）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诸子百家，后世“绝续不同，不能一概。后人著录，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故《四库全书》的“杂家”也是将名、墨、纵横合而为一类。不过《四库》的“杂家”范围更加广泛，共有六大类：“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牖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子部《杂家小序》）六类之中，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是就著作的内容而言，杂纂、杂编是就文献的体例而言。“杂家”成了一个大麻袋，举凡“子部”其它各类无法包容的书都可以统统捡入其中。

这个处理方法同样可供《儒藏》借鉴，我们将儒家著作中内容不纯一（或论儒学义理，或论儒者轶事，或论儒林掌故等）而又不可分析改编的著作，归在“杂说”之下；而将重在考证儒学名物故实、文献百科者，归入“杂考”；同时又将儒者论史或以史辅儒的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之属，作为“史论”而入“杂论”之中。

上列“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五类，是按儒学的理论特征和现存儒学文献的具体

状况划分的,这不仅可以将现存儒家的相关专著收录起来,编成相关专题的子学丛书;而且还可以根据这一分类,将分散在儒者集部各书中的学术论文辑录成编,形成一个个专题的学术类书,如根据需要可以编成《劝学集林》、《家训集林》、《闺训集林》、《劝善集林》、《乡约乡规集林》、《忠谏集林》、《君道集林》、《臣事集林》、《诸儒鸣道新集》、《儒学博考》等等专集,为前贤保存更多的专题性文献,也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求书方便。川大《儒藏》确立的“丛书”兼“类书”的编纂体例,在“论部”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儒藏》“论部”诸书大致可以模拟为古之“诸子”,但又不能局限于传统目录的“子部”。《汉志》有“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隋志》有“子部”14类。但“诸子略”、“子部”所录诸书并非儒学一家,而是学包九流、艺该百技,不是一个“儒家”所可笼统概括的。即使是后世的儒学诸子,也因时代变化,文献激增,不仅数量极其丰富,而且主题也日益繁多,不加分析必然杂乱无章。我们既不能将传统“子部”全盘照搬,笼统收入《儒藏》;也不能对古今儒家子学著作不加区分、无所鉴别地一骨脑儿收入。立足现存儒学文献的具体情况,结合儒家的学术特征,我们拟将《儒藏》“论部”按专题分为“儒家类”、“性理类”、“礼教类”、“政治类”和“杂论类”五大类,按这些专题将儒家子学著作以及学术论文收录起来,形成一个个专题丛书和学术类书,尽可能多地收集和保存儒家专题文献,为从事儒学专题研究的学人提供更多方便。而且通过儒家专题丛书的编纂,还会凸现儒家专题研究的学术成就,促进对儒家各个主题思想开展系统研究。如果通过《儒藏》编纂能够推动儒家专门之学的形成,又因专门之学的开展而提升儒学研究的水准,那将是我们苦心孤诣希望达到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 [1]舒大刚.儒藏总序[J]、儒藏编例[J].《儒藏》[M]“史部”第1册、第14册、第37册卷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5.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9).
- [2]舒大刚.谈谈《儒藏》的编纂分类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2004,4.又:《儒藏》编纂之分类体系初探[J],《国际儒学研究》第13辑,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又:《儒藏》‘史部’编纂之构想[J],儒联编:《儒学与当代文明》[M]第二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 [3]张立文.在四川大学《儒藏》首发式上的发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9).又摘要,见《四川大学学报》,2005,6.
- [4]钟肇鹏.略谈《儒藏》的编纂[J],“儒藏网”(http://www.ruzang.net).《四川大学学报》,2005,6.
- [5]陈恩林.读《儒藏》“史部·儒林碑传”有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0(10).又摘要,见《四川大学学报》,2005,6.
- [6]廖名春.读四川大学编《儒藏》之首批成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9).又摘要,见《四川大学学报》,2005,6.
- [7]蔡方鹿.读《儒藏》“史部·历代学案”[J],“国际儒联网”(http://www.ica.org.cn).又摘要,见《四川大学学报》,2005,6.
- [8]黄开国.四川大学编纂《儒藏》首批成果出版有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0(10).又摘要,见《四川大学学报》,2005,6.
- [9]黄修明.四川大学古籍所《儒藏》首批成果评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0(10).又摘要,见《四川大学学报》,2005,6.
- [10]杨世文.《儒藏总目》[M],四川大学古籍所印(征求意见稿).以下所引亦见此稿.

Research on a taxonomy of Ru Zang's Lun Bu

SHU Da-gang

(Institute of Ancient Litera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610064,China)

Abstract: Ru Zang is a large-scale monographic series on Confucian literature. Its purpose is to construct the bibliographical system of Confucian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we first enumerates both classical and modern taxonomy on catalogue, and then introduces our own taxonomy of Ru Zang, namely Three Zang and Twenty-four Mu, which links up all the four parts (Si Bu) of Confucian literature and comes down to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Moreover, our new taxonomy proposes that Confucian literature should be assorted into five genera (i.e., the Confucians, philosophy, etiquette, politics and essays) in the Lu Bu of Ru Zang..

Key words: Ru Zang; taxonomy on catalogue;Zi Bu; Three Zang and Twenty-four Mu